

理论探讨

新社会运动的形态特征及其治理效能*

高春芽

[摘要] 新社会运动的崛起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出现的重要现象,它在行为主体、价值取向和组织形态等方面具有时代性特征。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新社会运动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公民社会谋求参与治理的具体表现。由于面临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社会运动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之间存在冲突。

[关键词] 新社会运动;治理;民主;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9)03-0054-58

社会运动是指具有共同利益或相近思想的个人联合起来,通过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推进或阻止社会变革。在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和工业化过程中,社会运动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对于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推动民主化进程发挥了重大作用。社会运动的传统形式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为争取经济利益、政治权利而采取的组织性抗争,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二战后,欧美等西方国家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它们在社会基础、组织形态、议题范围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工人运动,所以又被称作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抗议政治的模式化认识,已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包括: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解析新社会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以政府为中心,考察新社会运动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视野,论述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尝试采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论述新社会运动的形态特征、治理效能及其发展困境。

一、新社会运动产生的背景

新社会运动主要是指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

方国家爆发的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宗教运动、环保运动等,其中,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的影响最大。有别于工业化时期的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并不试图控制公共权力或谋求社会再分配,而是追求自治、承认、参与等价值目标。新社会运动在本质上反映了现代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和公民社会集体行动模式的变迁,“带有战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痕迹”。^[1]

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积极抗争源于封闭的政治过程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他们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摆脱政治边缘化状态,并借助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论证反抗斗争的正当性。而随着二战后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发展,特别是普选制度的确立,政治过程的开放性趋于提高,常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弱化了激进主义的号召力。政治领域的另一重大变化是,政府的再分配职能不断扩张,劳资双方开始借助集体谈判和社会协商等形式分享社会财富、分担社会风险。在社会经济领域,西方国家通过发动信息技术革命,普遍提高了国民的消费水平和教育程度,社会成员的结构趋向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了服务行业的兴起,多数从业者不再是蓝领工人,而逐步转变为从事教育、医疗、科研、咨询和法律工作的白领阶层,一个不同于传统中产阶级的“新中间阶级”逐渐形成。随着民主政治社会基础的转变,社会冲突不再严格遵循阶级斗争的分野,而是围绕

*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治学方法论变迁视野中的集体行动理论研究”(TJZZ08-1-015)阶段性成果。

具体的议题展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变革逐渐将工业化时期的社会冲突制度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能够在改良的意义上实现互动调适。但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政府职能的扩张导致权力对私人生活的渗透,人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强;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凸显了少数群体权益保护不足;生活水平的提高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在实质上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等等。

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不仅是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变迁的结果,它还和二战后东西方社会关系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在冷战时期,形成了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它们在国际领域采取霸权行为和实施军备竞赛,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制造了不安的气氛。和平运动、反核运动应时而起,它们试图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推进社会力量在国内外公共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作用。此外,日益加速的全球化也刺激了新社会运动的高涨。全球化实现了资本的跨国转移,也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产业提供了可能;全球化实现了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也使外来移民的社会身份成为焦点问题;全球化实现了技术、信息共享,也使各国在治理全球变暖等问题上陷入囚徒困境。这些事实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反全球化运动、民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发展。

面对趋于成为全球现象的新社会运动,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无法应对自由主义挑战的结果;有的学者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表现;还有的学者指出,新社会运动源自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困境。^[2]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新社会运动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表现。在政治权利得到合法保护和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之后,人们开始要求社会领域中的多元价值和生活方式得到承认,并试图在常规的政治过程之外实现参与治理。这首先说明,公民社会中已经积聚可观的自由流动资源,它们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掌握,人们依此既可以相互提出要求,也可以向政府提出倡议。其次,新社会运动带有反国家主义的特征,这本身就说明政府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换言之,新社会运动能够自主掌握的资源比较有限,它必须通过抗议现有体制间接影响政策,或达到增强社会共识、重构社会力量对比等目的。最后,社会领域潜在的利益要求能够转换为现实的集体行动,它以西方民主制度的开放性作为条件。当现实的群体诉求与支持性的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相遇时,新社会运动才能显示其影响力。^[3]新社会运动因此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化心理危机,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市场存在密切联系。新社会运动是在政治制度趋于开放但又存在结构性失灵条件下,社会群体针对国家控制深度和强度的提高而采取的抗议。^[4]

二、新社会运动的形态特征

新社会运动涉及人权、环境、和平、全球化等多个议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上总结其基本特征殊非易事。从西方社会运动历史变迁的角度看,特别是以工业化时期工人运动为参照,新社会运动在参与主体、目标取向和组织形态等方面均表现出独特性。

从参与主体的角度看,新社会运动的成员主要由接受良好教育的新中间阶级构成,他们较少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虽然新社会运动常常被视为左翼的同路人,但它既向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准确地指出民主国家并非社会冲突的中立仲裁者;也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即在不能把新社会运动化约为阶级关系衍生物的状况下如何解释这些现象。^[5]

工业化时期,社会运动主要是工人阶级摆脱政治边缘化状态、进入权力中心的斗争工具,它是对政治过程封闭性的抗议。在工人阶级缺少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的条件下,意识形态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人道性,成为强化阶级意识的精神动力。而随着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运动的阶级基础受到侵蚀,基于性别、宗教、语言、种族的多元社会集团开始成为社会运动的主体。新社会运动缺乏统一的阶级观念,这反映了社会行动者分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它习惯性地被视为工人运动衰落的表现。如果人们深入分析西方国家的制度过程就会发现,非意识形态化社会运动的内涵十分复杂。从形式上看,它表明传统工人运动的政治目标已经实现,从工人运动中诞生的工党、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部分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工人阶级曾经为之奋斗的普选权已经写入宪法,非意识形态化是工人运动政治胜利的自然结果。^[6]从实质上看,新社会运动的中性色彩说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对抗性阶级力量,已经被民主政治的包容性所消化,社会运动已经成为政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新社会运动在改良而非革命的意义上是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表现。

从目标取向的角度看,新社会运动并不试图控制国家政权、分配社会资源,而是追求公民自主、社会自治、直接参与等价值目标,带有“后物质主义”特征。新社会运动并不将政治制度的一揽子改造作为其行动指向,而主要针对具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单一议题。在工业化时期,劳动者缺乏政治权利以分享社会产品,出现了马克思极力批判的异化现象。工人阶级为了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提出改造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斗争纲领。而在西方普选制度和福利国家建立之后,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之外的社会问题日益彰显。首先,新社会运动认为,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已经跨越生产领域进入消费、服务和社会关系领域,政府公共职能的扩张伴随着社会控制力的强化。如果说传统的工人运动试图从外部控制国家政权来改变生产关系的话,那么新社会运动的目标则出现了“内在转向”。^[7]新社会运动尝试在国家的监管制度之外,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自主治理。其次,工业化时期的工人运动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它表明既有秩序并非不可挑战,而是可以借助群体的力量加以改造。工人运动一般不具有反现代性的特征,它们主要关注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并不重视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而新社会运动对现代化的效率导向和科学主义提出了抗议,认为生活质量、生存环境具有首要价值,从而带有反思现代性的内涵。弗里德曼将这一特征总结为,“反对新的发展、反对工业革新、反对加强利用自然资源”。^[8]此外,传统的社会运动以国家为中心,抗议目标直接指向封闭的政治过程。而在现代西方国家,随着公民社会的分化重组,压迫性的力量不仅来自国家的制度结构,还来自狭隘的利益集团。所以,新社会运动在表现出反国家主义特征的同时,也对各种社会力量提出了要求。在诸如反种族歧视等运动中,抗议的目标不仅是确保政府尊重少数民族裔的公民权利,它还针对各种极端主义的右翼社会力量。

从组织形态的角度看,新社会运动不是通过科层机构而是社会网络提出倡议,坚持直接行动主义路线。传统的社会运动必须与强大的国家政权进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建立了严密的组织领导机构。充满悖论的是,虽然社会运动竭力反抗等级制国家结构,但自身为了提高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也不得不模仿对方的组织形态。社会运动在与国家政权的对立中,“陷入了不平等权力关系再生产的陷阱”。^[9]工人阶级通过组建工会采取集体行动,但它难以摆脱寡头统治铁律的困扰,理想主义的斗争精神容易被领导层的既得利益淹没。工人

运动因其组织化而丧失战斗力,“组织的巩固导致组织的衰弱”。^[10]与传统的社会运动不同,新社会运动面对趋于开放的政治过程,建立科层化组织结构的目标已不再迫切。它们采取直接行动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观念,其具体方式一般表现为聚会、游行、示威等。在大型官僚化的匿名社会中,新社会运动的志愿者能够从直接参与对抗中获得归属感。^[11]其次,新社会运动的决策过程不采取传统社会运动组织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全体通过制。^[12]组织者只起到召集人的功能,他们并不构成等级式的领导中心。新社会运动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和关系网络实现信息传递和群体动员。但缺少组织化也使新社会运动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缺陷,尤其是在与政府或强势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处于不利地位。新社会运动为弥补其组织劣势,往往充分利用有利的政治机会,提高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例如,1999年11月,西方反全球化人士在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期间,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导致此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此外,新社会运动虽然拒绝建立正规的组织结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接受企业、基金会等组织的援助,借助媒体的信息渠道增强其行动力量。在具体的议题上,新社会运动可以和非政府组织联盟,共同推进集体目标的实现。

新社会运动在参与主体、目标取向和组织形态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反映了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和主流价值的变迁轨迹。^[13]但人们不应该从这种结构性分析视角中得出结论,认为新社会运动仅仅是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伴生现象。它还与政治过程开放性的提高、公民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认同多元化紧密相关。在对新社会运动特征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种误导性观点,认为新社会运动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的新生现象。新社会运动、后物质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些具有时间断裂感概念的提出,往往暗示新旧社会运动的截然对立。然而,人们如果承认社会变迁的连续性,就能够从新旧社会运动中寻找到共同点。诸如追求非物质性公益目标、采取直接参与的行动策略等特征,均可以在历史上的宪章运动、戒酒运动和宗教运动中寻找到先例。^[14]对此可以提出的合理解释是,在现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背景下,新社会运动的上述特征不再被其他现象所掩盖,而日趋变得完整清晰。新社会运动并不意味着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彻底改变,它是人们在面临诸多难以统一或互不相容的价值目标时,有选择性地强调了某些价值。^[15]

三、新社会运动的治理效能

新社会运动的大规模涌现表明,现代国家并不能摆脱社会力量的影响。政治权力的全方位渗透导致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性增强,从而为社会力量直接影响政治过程提供了机会。新社会运动反对官僚化控制、提倡自主自治,它显示了国家政治能力的不足,也促使人们思考社会力量在集体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社会运动可以在“国家之外找到有效的治理体制”。^[16]

治理比政府管理的范畴要宽泛,它是正式的制度安排与公民社会的互动过程。^[17]围绕新社会运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具体作用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以国家为本位,认为新社会运动冲击了国家权威,是导致民主制度超负荷运转的直接原因,应对政府权能的弱化负有责任;另一种以社会为本位,认为新社会运动在政治权威之外宣告了治理途径的多样化,社会自治可以构成国家统治的对等形式。亨廷顿在《民主的危机》中指出,二战后出现的新社会运动是民主精神的复兴运动,但它已经对政府权威提出了全面挑战。^[18]以美国 20 世纪 60、70 年代为例,越南战争、种族冲突等社会问题刺激了政治参与,使其超越了政府能力的容纳范围,并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将其表面化。现代国家管理职能的膨胀,侵蚀了社会的自治领域,也导致国家与社会对立面的扩大,从而引起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萎缩。只有维护公民社会的相对自主性,避免政府职能的过度膨胀,才能保障政府具有稳定的合法性来源。亨廷顿略显保守的观点虽然言明了社会自治的价值,但其最终目的是提高政府的权威,将国家视为权力的中心。与这种观点不同,奥菲认为新社会运动是重构自主性公民社会的具体表现,它在政府规制和国家干预之外拓展了集体行动空间,目的在于建立“非制度化政治”(noninstitutional politics)。^[19]首先,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它使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相互融合。其次,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在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威之间营造了中介性的公共领域,社会力量可以在相对独立的空间发挥作用。最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对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的二元划分,使不同于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非制度化政治”成为处理集体事务的备选机制。奥菲超越了政治统治和政府管理的定式,在正式的制度规则和科

层组织之外论证了公民治理的现实性。如果说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模式仍处于“老政治”(old politics)的范畴,新社会运动则重新定义了现代政治的内涵,标志“新政治”(new politics)的诞生,它呼唤“公民社会内部的政治行动”。^[20]

新社会运动的治理效能主要表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形式的多样化。基于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长期被视为国家权力的中心,所以在西方国家出现选民投票率下降时,研究者将其视为公民文化衰落和政府权威流失的表现。而在此期间,各种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人们的参与热情有增无减。如果将上述平行发生的现象联系起来思考就可以发现,现代国家的治理主体、参与渠道已经多元化,社会群体无需借助正式规则实现意见表达。新社会运动奉行志愿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以民众的自由选择而非命令管制作为支撑,其权威只要获得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不同层面的权力中心。新社会运动首先是公民之间的横向互动,借助水平网络而非等级规则实现自我动员。其次,新社会运动还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横向互动,它表明社会并非国家的从属物,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威性资源同时被国家和社会分享。针对全球环境恶化等问题,环保运动的效能甚至超越了政府治理的局限。由于生态环境改善是全球性公共物品,各国政府的理性策略将导致“公共地的悲剧”。而趋于全球化的生态运动借助互联网等渠道发布公益性环境信息、揭露破坏性的环境政策,使人们认识到环境恶化的连带效应,在国际社会中形成“非中心化的权威格局”。^[21]新社会运动在通常情况下并不直接输出政策、提供服务,它们主要通过群体抗议阻止或推动某项议题,在社会中树立公共性的价值观念。组织化利益集团或政党相互之间讨价还价实现互利交易,与此相比,新社会运动往往具有不可妥协性。但新社会运动能够在具体议题上与非政府组织形成联盟或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参与供给公共物品。它们可以通过公益宣传、出席听证会、提供专业数据、监督政策执行或协助政策实施等方式,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当代西方社会被称作“社会运动社会”,这表明新社会运动已经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社会运动与常规政治的界限逐渐模糊。新社会运动挑战了国家的权力中心地位,显示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塑造作用,并引发了多元治理的讨论。但国家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可预见的将来,公民社会无法取代国家的权威。民主政府毕竟得到选民的明确授权,

在出现治理失灵的问题时责任方易于确定。而在公民治理失灵条件下,人们无法准确界定责任方。新社会运动谋求公民自主和社会自治,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但相互渗透的中间领域可以为彼此间的回应提供渠道,通过竞争合作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

余论

新社会运动作为西方国家蓬勃兴起的社会现象,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新社会运动带有非意识形态化的色彩,但它们必须面对强大的国家政权,在现有政治系统之外保持独立性和进入政治系统获得认可之间存在冲突。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灵活机动,但集体行动的灵活性与有效性之间存在紧张,在同利益集团或官僚机构的冲突中难以发挥组织优势。新社会运动主要限于地方或国家层面,在生态、和平等全球公共问题方面突破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建立全球性集体行动机制仍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 [1] [5] [美]杰弗里·伊萨克:《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6期,第65页。
- [2] 有关对新社会运动本质的认识可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等等。
- [3] Peter Eisinger,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in American Cit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7, No. 1,

1973, p. 25.

- [4] [15] [19] [20] Claus Offe,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Vol. 52, No. 4, 1985, p. 845, p. 850, p. 826, p. 832.
- [6] Jean Guy Vaillancourt,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Worker Participation to Societal Self Management",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19, No. 6, 1990, p. 822.
- [7] [14] Paul D'Anieri, Claire Ernst and Elizabeth Kier,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2, No. 4, 1990, p. 446, p. 454.
- [8]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自由选择》[M],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9页。
- [9] Rohini Hensman, "Social Movements: What's 'New'?",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9, No. 21, 1994, p. 1271.
- [10] [英]海曼:《比较工会运动》[M],许继峰等译,韦伯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 [11] [13]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 Industrial Societ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4, 1971, p. 1012, p. 991.
- [12]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 [16] [英]基思·福克斯:《政治社会学》[M],陈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 [17] [印]曼德等:《善治:以民众为中心的治理》[M],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编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 [18] [法]克罗齐、[美]亨廷顿等:《民主的危机》[M],马殿军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 [21] [美]奥兰·杨:《世界事务中的治理》[M],陈玉刚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5页。

作者简介:高春芽,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政治学理论博士后研究人员。(天津,300387)

收稿日期:2009-02-25

修改日期:2009-03-21

ence among scholars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and implication of the term, delimitation of periods in Chinese Studies, subject building, methodology and so on, which, to a large degree, affect the all-around development and academization of the study in this field.

Theoretical Probes

- 5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Social Movement and Its effect in Governance *by Gao Chunya*
New social movement, arising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in terms of entity of actor, value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hape.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change, new social movement, as a result of the disequilibriu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s the sign of civil society seeking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Facing some objective constraints, new social movement falls into a conflict between autonomy and effectiveness.
- 59** Politics of Great Powers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by Huang Qixu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becoming a hot topic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urrent researches on this issue always concentrate on how emerging technologies reshape world politics, and they try to use domestic factors 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indicate that international factor is more powerful in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change. If we try to understand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world,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se great powers.

Countries and Regions

- 64** Comment on the New Version of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y Liu Fenghua*
In July, 2008, President Medvedev approved the new version of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hich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and clearly expresses Russian confidence as a big power in mo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formulating international agenda and constructing new world order. The new version is a carry-on of most of the contents of the 2000 version, including Putin’s foreign policy line and several policy principl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djusts Russia’s policy and position on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areas.
- 68** A New Version Of Human Rights Diplomacy —Merkel’s Shared Value Diplomacy *by Li Wenhong*
In recent years, many researchers have done much work in human rights diplomacy of the Red-Green Alliance in Germany and different comments have been made on Merkel’s shared value diplomacy in some newspapers and other mediums, but few people have made analytical researches by putting Merkel’s viewpoints into the wider framework of human rights diplomacy.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article is meant to make a study of the new version of human rights diplomacy, Merkel’s shared value diplomacy. The author wishes to throw out a minnow to catch a whale in researches on human rights diplomacy so as to estimate correctly our own strength as well as that of our opponents and win initiatives in communicating with western countries.
- 75** Junichiro Koizumi’s Political Tactics and the Feature of his Cabinet *by Shao Jianguo*
Traditionally, th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Japan is from bottom to top.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cedure seriously limited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fter becoming the prime minister, Junichiro Koizumi strengthened the role of the cabinet and the consultant committee of Finance and Economy, and set up a new position of assistant to the Prime Minister, thus greatly changing the policy making procedure. Policy making became domina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Japanese politics under Junichiro Koizumi appeared to be the feature of “presidential politics”.